

《新青年》与新文学潮流的疏离

王 焯

摘 要:《新青年》文学革命成功之后,逐渐疏离新文学发展的潮流。在新文化运动由文化启蒙向文学启蒙、新文学由启蒙文学向革命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新青年》逐渐减退建设新文学的热情,失却影响文学与社会的文化能力。《新青年》开创新文学的功绩不容抹杀,但它推动新文学向前发展的成就却非常有限。《新青年》杂志的文化与同人性质,是其疏离新文学潮流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新青年;新文学潮流;疏离;原因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08)01-0031-06

在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中,《新青年》杂志因倡导“文学革命”和激烈“攻击儒家和赞扬西方思想”^[1],被视为五四新文化与新文学运动的肇始与标志,成为现代文化思想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杂志之一。近年来,《新青年》杂志引起学术界重视和研究兴趣,人们研究“他的编辑方针,他的编辑部,他那个著名的同人圈子”^[2],探讨它跟晚清变法、辛亥革命等革新思想“一脉相承的”^[3]渊源关系。与《新青年》初期、中期形成研究热潮的现状相比,《新青年》转向马克思主义的后期研究却显得沉寂,其与新文学发展潮流的关系尚未得到广泛探讨。深入研究《新青年》“文学革命”之后逐渐疏远新文学发展潮流的情状及原因,以便全面、深入认识《新青年》在新文学史上的价值及性质,应是《新青年》研究及新文学史研究不容忽视的课题。

受五四爱国运动与国民革命的影响,新文学进入20年代后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新文化运动由文化启蒙向文学启蒙转型,新文学由启蒙文学向革命文学发展,以革命文学来推动、完成文学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呼声高涨。在这种双重的语境转换中,《新青年》杂志仍然恪守自己的文化启蒙与启蒙文学,逐渐失却推动

新文学发展的动力及社会影响力。《新青年》由文学革命的急先锋瞬间沦为新文学的落伍者,表面上是其机关刊物的转变所致,实质上却是它的编辑思想守旧、僵化造成的,未能随着文化与文学潮流的发展而改变刊物的性质与同人态度。

随着五四爱国运动的落潮与国民革命运动的逐渐高涨,五四启蒙文化运动产生新的历史变化。思想觉悟的新青年积极实践文学与革命,新文学由启蒙文学向革命文学发展。新文学与现代革命的日渐结合,使革命文学在五卅运动前后走向初步繁荣。

1917年《新青年》进行的“文学革命”运动,催生了中国现代的启蒙主义文学。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等《新青年》同人,不仅以通俗的“白话”创制新文学的表现形式,以便为未来民族国家创造“文学的国语”,而且以“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创制新文学的现代启蒙性质,即以“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4],从而实现跟传统文学的彻底决裂。《新潮》、《少年中国》等新文化刊物积极加盟,壮大了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的力量;晨报副

作者简介:王焯(1967—),文学博士,厦门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20世纪革命文学研究。

刊》、《国民日报·觉悟》《时事新报·学灯》等报纸及其副刊纷纷改变态度转而发表白话文学创作。文学革命的“白话文运动”在短暂的二、三年间取得决定性胜利。五四爱国运动之后,新文学出现初步繁荣的历史景象,众多青年与学生积极从事新文学创作,众多的新文学社团与刊物大量涌现。在启蒙主义“人的文学”影响下,“人生问题”、“青年爱情”、“女子问题”等各种“辟人荒”的文学主题成为创作热潮。

几乎在“人的文学”刚刚盛行的时候,社会上出现了对它的批评。1920年底,北京大学哲学系、社会学系的师生郭梦良、陈伯隽、陈启修、王世杰、高一涵、费觉天等人组织、成立一个新文化团体,创办了《评论之评论》杂志高扬起“评论”的天职和使命,决心为混乱、黑暗的中国社会开辟一个公共的言论机关。本着这种“评论”的态度,费觉天批评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的倡导者,认为他们过于重视革命理论或主义的宣传,而忽略文学对革命的巨大作用和价值。他认为,革命“所持的是盲目的信仰,情感的冲动,而非理智”^[6],在唤起民众的革命情绪方面,革命理论的宣传不如文学的感染那样奏效。为了中国的革命计,他呼吁革命家要拿起文学这个利器,要求从事新文学的人要自觉地建设“革命的文学”,以帮助中国现代文学革命和社会革命任务的完成。1921年7月,他写信给远在上海的郑振铎,表达自己的思考并希望唤起文学研究会的重视。他说:“我相信在今日的中国,能够担当改造的大任,能够使革命成功的,不是什么社会运动家,而是革命的文学家。今日中国有么!我未曾见。我相信今日中国革命能否成功,全视在此期间能否产出几个革命的文学家。”^[6]

费觉天要求革命者重视文学的作用,得到郑振铎、茅盾为首的文学研究会的呼应和支持。郑振铎认为,“在今日的中国,能够担当改造的大任,能够使革命成功的,不是什么社会运动家,而是革命的文学家”。他从文学是“情感的产品”的观念出发,认为在刺激人们的革命情绪方面,革命文学的感染比革命理论的说教有效。他说,“俄国的革命虽不能说是完全是灰色的文学家的功劳,然而这班文学家所播下的革命种子却着实不少。就是法国的大革命,福绿特尔的作品对于它也是显很大的能力的。”^[7]文学研究会成员李之常也认为,在“第四阶级”推翻资本主义的现代革命中,血泪的、革命的、民众的文学所发挥的作用胜于宣传革命理论的“小册子”,期望革命启蒙者高扬起文学是“时代的指导者、鞭策者”的旗帜,“革命的完成者

在中国舍文学又有什么呢?”^[8]茅盾把革命文学视为世界文学的新生潮流,认为它“能够担当起唤醒民众而给他们力量的重大责任”,盼望“从此以后就是国内文坛的大转变时期”^[9]。

文学研究会强调文学家与文学的重要作用,并非仅是对费觉天的简单响应,而是对新文学建设的思考及新文学话语权的争夺。文学研究会提倡“为人生”的文学,但当时文坛礼拜六、黑幕小说等盛行不衰。受五四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时代情绪影响,文学研究会将文学与社会、革命联系起来,努力将新文学建设成反映社会、表现现代革命精神的文学,成为“新时代的先驱,为人生的,支配社会的,革命的”^[10]。然而,五四时期西方学说与革命理论的宣传成为新文化运动主流,文学革命仅成为新文化运动一个子系统。因此,新文学的社会空间不仅要靠反抗旧文学来争取,而且要靠批评新文化运动“主义热”来实现,即“文学是大有功于革命,而革命家必得借助于文学”^[11]。文学研究会重视文学家作用的主张,跟恽代英、邓中夏等革命家的态度构成鲜明对立,后者认为就革命而言重要的是革命者而非文学家,“印度有了一个甘地,胜过了一百个文学家的泰戈尔”^[12]。

《评论之评论》与文学研究会批评革命家轻视文学家的同时,也批评启蒙主义文学日趋泛滥与浅薄的堕落趋势,积极从事“革命文学”的建设,以实现文学与革命的结合,完成文学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双重历史任务。郑振铎批评新文坛现在所有的“最高等的不过是家庭黑暗婚姻痛苦,学校生活,与纯粹的母爱的描写者”,而“叙述旧的黑暗,如士兵之残杀,牢狱之残状,工人农人之痛苦,乡绅之横暴等等情形的作品可称得是‘绝无仅有’”^[13]。他指出,“我们现在需要血的文学和泪的文学几乎要比‘雍容尔雅’、‘吟风啸月’的作品甚些吧。”^[14]李之常支持这种“血泪”文学观念,呼吁新文学要反映“中国的多方面的病的现象之真况”^[15]。他们认为这种描写社会痛苦的文学,能唤醒、培养人们的革命情感,“一般人看了以后,就是向没有与这个黑暗接触过的,也会不期然而然的发生出憎恨的感情来”,革命就需要“这种憎恨与涕泣不禁的感情”^[16]。新文学应成为革命文学而非“风花雪月”性质的启蒙文学,得到创造社与早期共产党人的积极响应。1923年,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创造社元老以《创造周报》为阵地,开展热烈的新文学使命的讨论,他们在坚持自我表现的文学观念基础上,决意今后的创作要表现生命的反抗烈火,要“爆发出无产阶级的精神,精赤

裸裸的人性”^[7]。他们指出革命文学批判的对象,不仅是制造社会黑暗与痛苦的军阀列强,而且是束缚生命自由的社会制度与“天理国法人情”。恽代英、邓中夏、萧楚女等早期共产党人也转变鄙视文学的态度,认为文学不是清高的“雅人韵事”,真正的文学家应该像托尔斯泰一样到民间去,到社会黑暗、痛苦的地狱中去,以体验人间的不幸和艰苦。他们劝导文学家要多创作“表现民族伟大精神的作品”与“描写社会实际生活的作品”,认为在军阀专权、列强剥削日益沉重的社会境况中,富有刺激性的革命文学能“警醒已死的人心,抬高民族的地位,鼓励人民奋斗,使人民有为国效死的精神”^[8]。

总之,由于五四爱国运动的落潮与国民革命运动的逐渐高涨,新文学家与革命家都产生对启蒙主义文学的不满与批评,呼吁新文学要表现出“革命”的情绪与性质,以实现文学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历史任务。1923年后,留俄知识分子瞿秋白、蒋光慈等人先后回国,他们与文学研究会同人一起,以《中国青年》、《民国日报》、《文学旬刊》等为园地,积极进行革命文学的创作与建设,推动五四启蒙主义文学向革命文学的转型。革命文学潮流在五卅运动前后迅速兴盛起来。

在1920年代中期,热情提倡革命文学的应是《民国日报》与《中国青年》。在国共合作之初,《民国日报》副刊主笔邵力子邀请共产党人加入副刊编辑队伍。1924年5月20日,茅盾创办、主编《航育》副刊(后由何味辛继任),以“血花”、“红花”栏目选刊大量革命诗歌,刊发许多描写下层社会生活的小说。1924年11月,沈泽民接编《觉悟》副刊,决定逐日发表蒋光慈的革命文学创作,向文坛介绍这位刚从俄国归来并以革命作家自负的诗人,又联合上海大学师生成立春雷文学社,在《觉悟》上开辟“春雷文学专号”。《民国日报》的《觉悟》和《航育》副刊,由于共产党人茅盾、何味辛、沈泽民的接编,不仅大量发表革命文学作品,而且积极支持革命文学社团悟悟社、春雷文学社的文学活动,使其成为1920年代中期革命文学倡导的主要园地。受革命文学潮流的影响,尤其是瞿秋白、陆定一先后参加编辑,共产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中国青年》热情发表革命文学创作,既发表刘一声、朱自清、绍吾、吴雨铭等革命诗人的诗作,又发表瞿秋白、济川、陆定一等人创作或翻译的革命小说或童话。总之,《民国日报》与《中国青年》成为革命文学倡导的急先锋,成为时代情绪与文学潮流高涨的文化象征。

从费觉天的最初呐喊到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共

产党人的积极提倡,从国内新文学家革命文学的意识自觉到瞿秋白、蒋光慈等国后的积极加入,从革命文学的主张到悟悟社、春雷文学社的出现,都表明革命文学已成为“五四”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9]。在文化启蒙向文学启蒙、启蒙文学向革命文学转变的历史语境中,《新青年》逐渐失去文学热情和发展自己的动力,新文坛上的地位与作用被《中国青年》、《民国日报》等所取代。

二

《新青年》的创刊宗旨及其实际编辑方针、基本面貌,呈现出以学术文化促进思想革命的历史追求。在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下,它开展了社会、政治、宗教及文学等问题的讨论,因激烈批判封建礼教和进行文学革命而取得社会影响。文学革命成功后,《新青年》失去对新文学的关注,逐渐脱离新文学的发展潮流,给人留下它提倡文学革命“本来就不是出于对文学的虔敬”^[10]的历史印象。

《新青年》创刊宗旨是“盖欲以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11],这使它成为一个思想文化刊物而非文学性质的杂志。随着胡适的加入及文学革命的倡导,随着它的北迁及北京大学革新力量的参与,《新青年》的文学性质愈来愈浓厚。胡适的白话诗尝试、鲁迅的小说创作、《新青年》同人的“随感录”等都赋予《新青年》强烈的文学倾向。从1918年1月15日4卷1号开始,《新青年》发表文学方面的文章明显增多,并且占据每期的首要位置,4卷4号、5卷4号就把文学性质的文章排在杂志头版位置,4卷6期、5卷4期两期全都是文学性质的文章。这些迹象表明,《新青年》在1918年后对文学倾注更多热情。在此期间,《新青年》发生由思想学术刊物向文学杂志的变化,完成以白话取代文言的文学变革,取得以学院的合法性向社会传播、渗透的历史胜利。《新青年》进行文学革命的动因,是要使“白话文”成为中国文学的利器与国语的手段,但随着白话文作者的增多与教育界通过小学教科书改用白话文的议案,文学革命完成的同时也意味着文学“又渐渐的不成问题了”^[12]。1919年12月1日的7卷1号成为《新青年》历史的转折点。这种转折不仅是“从学术化向政治化的转变”^[13],而且是文学性质向思想文化性质的重返。7卷以后的《新青年》头版位置让给“政治”和“新思潮”,大量版面被政治、社会、教育、文化等方面的文章挤占,而文学创作、翻译等重新成为杂志的“报屁股”。尤其是7卷4号的“人口问题”专号和7卷6号的“劳动节纪念号”以后,文学方面的文字愈来愈

愈少。1920年9月8卷1号开始,《新青年》明显成为宣传社会主义运动的刊物,一批信仰社会主义的作者群取代了原先的自由知识分子,他们赋予《新青年》浓厚的政治色彩,也使《新青年》遭遇军阀政府压力而被迫南迁广州。此时,《新青年》每期刊载的少许文学作品,不仅跟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宣传不协调,而且失去实践文学的热情气象,成为真正装饰杂志的“应景”栏目。《新青年》编辑方针与面貌的调整、变化,隐喻从文学重返文化的意图,尽管它每期还发表几首诗歌或一、两篇小说,主编陈独秀还“很盼望豫才先生为《新青年》创作小说”^[24],但疏离、淡漠文学的情状十分明显。《新青年》日益疏远新文学,跟文学革命任务的完成有关,与陈独秀重新介入社会政治的决意有关,更主要的是《新青年》同人多是非文学家的启蒙主义者,他们促成新文学的诞生但并不愿意去实践它。

1923年6月15日,《新青年》改为季刊重新出版后,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的理论刊物,从此彻底脱离新文学潮流、不再关注文学。《新青年》季刊出版宣言提出“要收集革命的文学作品”,以“与中国麻木不仁的社会以悲壮庄严的兴感”^[25],第1期以头版位置发表文学作品^[26],但2期以后直到1926年7月停刊,除发表蒋光慈几篇随感性质的《并非闲话》杂文外,再没有发表文学方面的文章。《新青年》季刊希望继承《新青年》时期的杂志风格,希望发表“革命文学”以便与新文学潮流、时代潮流保持一致,但它最终还是成为纯粹理论刊物的风格。《新青年》季刊“新宣言”与实际编辑的差异,可能隐含这样的冲突,即陈独秀、瞿秋白等编者的文学爱好跟共产党组织强调理论宣传的矛盾。总之,《新青年》进入季刊时期就彻底疏离新文学,成为名副其实的理论学习刊物,失去对新文学的建设与影响。

《新青年》疏离新文学潮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新青年》没有保持与新文坛的紧密联系,既不能吸收冰心、郭沫若、康白情、叶圣陶等崭露头角的文学新秀,也不留意新文学发展状况与趋向;换句话说,《新青年》开创的“白话文学”被新文学潮流抛在身后,白话诗歌的诗性探索与创作被《新潮》、《少年中国》等后起者取代,文学研究会作家与创造社作家的小说也遮蔽鲁迅小说的锋芒。受同人刊物的影响,《新青年》还发表一些不和时宜的“关系稿”^[27]。因此,《新青年》20年代后就不断遭到成仿吾、闻一多、蒋光慈等人的批评。其次,《新青年》文学革命成功后,其倡导者多转向自己的专业领域。文学革命者除周氏兄弟外多为“半路出家”的作家,他们从事文学革命仅为“开风气”

的倡导,文学革命成功后就不再从事文学,胡适致力于再造文明的新文化建设,钱玄同、刘半农埋首语言学,陈独秀热衷社会与政治。启蒙主义者非文学家的身份,使他们无法、无力继续实践新文学的开拓,为新文学发展做出更多、更大贡献。最后,《新青年》季刊时期完全失去文学的热情,取消了“文艺栏”而不再发表文学作品。如果说,这是它机关刊物的性质使然,那么,同样为机关刊物的《中国青年》为何越来越多地发表革命文学?^[28]为何《民国日报》对革命文学倾注热情?可见,这跟《新青年》季刊的性质并未有必然关系。陈独秀为季刊撰写的新宣言,曾要求季刊要收集革命文学作品以兴起革命情绪,但季刊却违背陈独秀意愿而致力于理论宣传,其间隐喻的矛盾与冲突耐人寻味。

《新青年》主要受到陈独秀的影响与控制,通过新文化创造新的政治理想进而改造社会的宗旨始终没有动摇。文学革命期间,它虽对文学产生过短暂的热情,其意义不过是“为新思想凿通一条传播的渠道”^[29],白话文胜利之后就逐渐减退文学建设的热情。《新青年》开创新文学的功绩不容抹杀,但它建设新文学传统与推动新文学发展的成就却非常有限。

三

《新青年》同人的非文学家身份,并不是它与新文学潮流疏离的根本原因。杂志的文化性质与同人圈子,是导致它逐渐背离新文学潮流的真正原因所在。

《新青年》是文化性质的刊物,前期的文化启蒙与后期的理论宣传,都使它不能像文学杂志那样致力于文学。《新青年》的创办是为“探求拯救中国之道而奋斗”^[30],注重以科学与民主的思想革新国民的灵魂,尽管它创刊时就设有“文艺栏”,“文艺栏”始终也没有被取消,但那不过是丰富杂志内容的一种方式。1916年2月,胡适向陈独秀表达“为祖国造新文学”^[31]的愿望后,《新青年》开始关心文学并萌生文学革命的意志,因为陈独秀认识到文学与国民精神互为表里,“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32]。在陈独秀的支持与鼓励下,《新青年》成为“文学革命”的急先锋,在1918、1919年表现出更多的文学性,仿佛有向文学杂志转变的趋势。即使如此,它并没有根本丧失文化杂志的性质,讨论思想、道德、学术、政治、教育、女子等社会问题的文章仍然继续,只不过文章数量减少一些。总之,文学革命只是《新青年》文化启蒙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文艺栏及其文学革命都没有改变它的杂志性质。随着白话文的胜利与社

会现实的日趋沉重,《新青年》就疏远文学而转向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宣传。

《新青年》成为机关刊物后,“新辟《俄罗斯研究》专栏,从而更加集中地宣传马克思主义”^[83]。在这种情况下,它没有因性质的变化而彻底摒弃文学,仍然刊发同人的白话文学创作。《新青年》文学热情的减退与文艺栏的固守,真实呈现了它的文化杂志面貌,即它涉及政治、道德、文学、教育、学术等广泛知识领域。

《新青年》季刊时期彻底告别《新青年》这种文化性质,成为真正纯粹的机关理论刊物。《新青年》季刊的主编瞿秋白是一个热情的革命文学倡导者,他始终支持蒋光慈从事革命文学,也创作不少的革命文学作品,所以,《新青年》季刊创刊时曾希望继承《新青年》的杂志风格,希望刊载一些革命文学的作品鼓动青年的革命情绪。但这种愿望与刊物的理论性质产生了冲突,可能也有共产党组织与共产国际的政治压力,《新青年》季刊被迫舍弃初衷而成为纯粹的共产主义理论刊物。

《新青年》的文化性质与季刊的理论性质,使它始终重视社会现实问题与国家政治,文学革命成功后就不断疏离文学潮流,后来甚至彻底摒弃文学而致力于理论宣传。《新青年》两位主编陈独秀与瞿秋白对文学的独有情钟,在文化杂志与理论刊物的性质规定及制约中,就这样无奈地被割舍了。《新青年》疏离文学的历程与其主编文学情怀的被压抑、隐喻晚清以来以文学革新国民灵魂的文学革命运动的转型与终结,为社会现实所迫的激进知识分子再次抛弃文学的幻想与追求而选择直接的革命实践,把文学留给了专门从事文学的文学家。

《新青年》疏离新文学潮流还受到“同人性质”的重要影响。《新青年》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有强烈的同人倾向,首卷的主要作者高一涵、易白沙、刘叔牙、高语罕、潘赞化、谢无量等人,多是以陈独秀为首的皖籍知识分子,“且互相间有共事革命的背景”^[84]。第二卷新加入的李大钊、吴稚晖、胡适、刘半农、马君武、苏曼殊、杨昌济等人,“与主编陈独秀熟稔和有一定交谊的朋友”,“该卷《圈子杂志》的色彩仍旧浓厚”^[85]。1917年《新青年》迁移北京编辑后,新加入的作者沈尹默、钱玄同、章士钊、周氏兄弟等人,多为北京大学文科师生,1919年后“所有撰译,悉有编辑部同人共同担任”^[86]。如果说,《新青年》从创刊至停刊都有“同人杂志”的色彩与性质,作者群与主编都有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的人事渊源关系,那么,《新青年》成为共产党中央的理论季刊后“同人倾向”更为明显。《新青年》季

刊的主要撰稿人瞿秋白、蒋光慈、郑超磷、尹宽、彭述之、周佛海、李季等,多是留苏归国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他们成为季刊作者群的重要骨干,而不信仰共产学说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不深的作者都被摒弃在“圈子”之外。

《新青年》的同人倾向与性质,使它仅刊载同人作者的文学创作或翻译,不能积极吸收与壮大文学作者队伍。《新青年》倡导文学革命以后,文学作者群始终没有变化,小说作者仅为鲁迅、陈衡哲两人,白话诗人仅为胡适、沈尹默、刘半农、周氏兄弟、俞平伯等“尝试”时期“半途出家”的作者。新文学创作中不断涌现并产生较大社会影响的新作家,如郭沫若、康白情、刘延陵、汪静之等新诗人,如冰心、叶绍钧、郁达夫、许地山等小说作家,如田汉、陈大悲、欧阳予倩、丁西林等话剧作者,《新青年》杂志既不关注也不热情吸收。《新青年》囿守同人态度,导致作者群弱小与文学创造力匮乏,白话诗创作始终默守“胡适体”的规范与风格,鲁迅的小说创作仍旧一味地抒发着他的孤独与感伤。

《新青年》的同人态度也使它不关心新文学的发展。在1920年代初,白话诗已由胡适《尝试集》的写实性向郭沫若《女神》的抒情性飞跃,小说创作由社会问题小说向现代心理小说转型,新文学潮流由启蒙主义向革命文学过渡。在这些新文学的发展变化中,《新青年》同人的文学创作显得非常陈旧,也显得缺乏创新、发展的愿望与力量,文学趣味的陈旧与保守态度,使《新青年》跟新文学潮流的发展日益脱离,并且丧失推动新文学发展的意志与力量,文学的社会影响力被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社团取代。正像钱杏邨批评鲁迅的那样,《新青年》同人的文学创作“真能代表五四时代的创作实在不多”^[87]。

《新青年》因为不能打破文化杂志的性质与同人倾向的束缚,结果逐渐脱离新文学的发展潮流,给它造成不幸的历史后果,逐渐失去在青年、社会与文学中的影响力,导致杂志滞销甚或停刊的厄运^[88]。这首先表现在它的《文艺栏》不活跃、繁荣。《文艺栏》为几个同人作者占据,始终不愿积极吸纳新文坛的后起之秀,丧失了文学创造、发展的源泉与活力,丧失了推动白话文学发展的热情与魄力,结果社会影响力被后起的《少年中国》、《新潮》、《小说月报》、《创造季刊》、《晨报副刊》等新文化刊物所遮掩、取代。其次,《新青年》逐渐失去对社会、青年的影响力。20年代是青年的时代也是文学的时代,五四过后青年人的新文化兴趣转向了新文学,从1921到1923年的两、三年,全国就出现

40多个文艺社团、50多种文艺刊物，而到1925年先后成立的文学社团及其刊物就有100多个。随着青年人文文学兴趣的高涨，杂志风格开始由文化性向文学性转变，各种文艺社团的刊物文艺色彩非常浓厚。在这种历史变化中，《新青年》背离时代文化潮流与青年心理渴求，在青年群体中的影响力愈来愈弱，即使它不因激烈而被政府查禁，也会因影响力的丧失而被迫停刊。《新青年》季刊的影响就远逊于《中国青年》，因为后者编辑灵活并以大量文学作品活跃刊物。

《新青年》杂志及其文学革命的历史命运，让人们看到它编辑思想的僵化与守旧，不能随社会文化的变化而改变、发展自己。在这种意义上，它呈现出十分鲜明的“近代”杂志性质，即它是宣传主编、同人思想的刊物而不是满足社会公共需求的现代商业杂志^[9]。因此，它在文学革命成功后，因主编思想激进而走向马克思学说的政治实践，就逐渐疏离新文学潮流从而丧失影响力量。

参考文献：

- [1] 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521、522页。
- [2] [20] [23] [29] [36] 王晓明编：《批评空间的开创》，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187页、200页、191页、200页、第192页。
- [3] [34] [35] 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页、6页、11页。
- [4] 周作人：《艺术与生活》，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
- [5] 费觉天：《从文学革命与社会革命上所见到的革命的文学》，1921年12月25日《评论之评论》1卷4期。
- [6] [7] [13] [16] 郑振铎：《文学与革命》，1921年7月30日《文学旬刊》9号。
- [8] [10] [15] 之常：《支配文学的文学论》，1922年4月21日《时事新报·文学旬刊》35号。
- [9] 茅盾：《“大转变时期”何时来呢》，1923年12月31日《文学周报》103号。
- [11] 费觉天：《答吾友郑西谛先生》，1921年12月25日《评论之评论》4期。
- [12] 秋士：《告研究文学的青年》，1923年11月17日《中国青年》5期。
- [14] 郑振铎：《血和泪的文学》，1921年6月30日《文学旬刊》6号。
- [17] 郁达夫：《艺术与国家》，1923年6月23日《创造周报》7期。

[18] 邓中夏：《贡献于新诗人之前》，1923年12月22日《中国青年》10期。

[19] 张大明：《不灭的火种——左翼文学论》，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4页。

[21] 陈独秀：《青年杂志社告》，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1卷1号。

[22] 胡适：《新思潮的意义》，1919年12月1日《新青年》7卷1号。

[24] [30] [31] 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6页、68页、71页。

[25] 瞿秋白：《新青年之新宣言》，1923年6月15日《新青年》季刊1期。

[26] 该期发表了瞿秋白翻译的《国际歌》、创作的《赤潮曲》和郑韦之翻译的俄国小说《阶下囚》。

[27] 参见刘纳：《说说“新青年”的关系稿》，《从五四走来——刘纳学术随笔自选集》，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9页。

[28] 《中国青年》除发表邓中夏、恽代英、秋士、王秋心、济川等人的文学论述文章外，还发表革命文学作品。自第4期始至停刊，它发表瞿秋白、定一、沈泽民、蒋光慈、彭士华等人创作或翻译的小说15篇，发表刘一声、朱自清、绍吾、吴雨铭、日光等创作或翻译的诗歌19首，此外，还发表凤歌等创作的戏剧、寓言作品。

[32]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1917年2月1日《新青年》2卷6号。

[33] 朱文华：《陈独秀评传》，青岛出版社1997年版，第157页。

[37] 钱杏邨：《死去了阿Q时代》，1928年3月1日《太阳月刊》3期。

[38] 1917年底，《新青年》因发行不广，书社企图“中止”，陈独秀等人与之交涉，益群书社才勉强继续刊行。1920年《新青年》脱离益群书社而独立，反映出陈独秀维护《新青年》杂志不受商业利益影响与操纵的决心。《新青年》的停刊与《新青年》季刊的不定期出版，也与它的社会影响不广有一定关系。

[39] 陈独秀始终维护《新青年》宣传编者的办刊用意，极力避免它受社会及商业的影响与操纵。亚东书局与益群书社因《新青年》销路不广多次要求停刊，都被陈独秀坚决否定。《新青年》1920年7卷6号出版“劳动节纪念号”，因页数比平时多，群益书社决定加价，引起陈独秀不满，决定《新青年》脱离群益书社。这些表现反映出陈独秀维护《新青年》不受商业影响与操纵的决心。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中文系，福建 厦门 361005）

（责任编辑：陈 执）